

前言

陳國球

作為現代知識的「書信文化研究」(Epistolary Studies)在西方學界可謂方興未艾，當中尤其以「書信體小說」最為文學研究者注意。這種文學類型以 15 世紀西班牙作家狄阿戈·德·聖佩德羅 (Diego de San Pedro) 的小說《愛之監牢》(*Cárcel de amor*) 為先驅；到 18 世紀就大行其道，英國、法國、德國等都出現了重要的書信體小說；研究者紛紛從長篇小說的發展，當時的物質條件、社會風尚，以至哲學思潮等角度，探討其興衰的意義。這種體式的文學類型，經由西方傳入中國；據近人考查，香港第一任總督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1789-1856) 的秘書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 所撰宗教宣傳作品《誠崇拜類函》，就被譽為最早用漢文寫成的「書信體小說」。到五四新文學時期，單向、雙向或多向的書信，就成為新興的小說文體一種創新技法。然而，當我們回看中國傳統，書信本就是「集部」之學的重要體類。劉勰在《文心雕龍》的〈書記〉篇特別提到這種書寫現象，舉出司馬遷〈報任安書〉等說明「漢來筆札，辭氣紛紜」；又說：「文藻條流，托在筆札。」以文學性的思考而言，西方書信體研究主要用力於西方小說 (fiction) 之虛構與寫實之間的錯體虛實互換，是敘事體技藝上的操演與鍛鍊；中國書信體傳統則重在「實用」與「彰彰」的辯證相生；比方說，周亮工《尺牘新鈔》〈選例〉認為這種文體「事本酬酢，辭取從與」，而他則專門講求「抒寫性情，標舉興會」，重在文學性的表現；類似的兩端游移思考非常普遍。

換言之，西方開發的「書信文化研究」重點，與中國傳統的書信

體論述所關心者不同，但二者的交集卻頗有可述。正如上文所述，書信體小說自西方傳入而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學，但這種現代技法又有沒有傳統集部書啟類的影響呢？很值得注意。另一方面，西方研究多聚焦於虛構文體中書信的敘事作用，但近年也逐漸有了不同途徑的開展。其中之一是更多注意具體書信的社交功能（例如：D. Barton and N. Hall, eds., *Letter Wri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此外又因為通訊載體隨著時代推移而變化，提出「書信性質」（letterness）的探索（例如：Liz Stanley, “The Death of the Letter? Epistolary Intent, Letterness and the Many Ends of Letter Writing,” *Cultural Sociology*, vol. 9 (2015): 240-235）。有趣的是：這些新近方向的論述反而可以與傳統中國書啟類的文體論述對照互參。2019年美國德州大學創立了專門期刊《書信文化研究學刊》（*The Journal of Epistolary Studies*）；從其中論文題材的廣度，可以見到這個學術議題的多元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新刊物開卷第一篇論文：〈文學批評的書信體〉（Antje Richter,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Epistolary Mode”）；文中的重點是曹丕和曹植二人如何以書信宣示他們的文學見解，而與之對照的西方的書信體文學批評家包括英國詩人濟慈、奧地利作家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以及德國猶太詩人格特魯德·科爾馬（Gertrud Kolmar, 1894-1943）等。事實上，本文作者稍早已經主編了一本論文集《中國書啟與書信體文化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etters and Epistolary Culture*, Leiden: Brill, 2015），就中國的書信傳統作了許多新探索。

由上文的粗略介紹，可知跨文化的書信體研究實在大有空間發展。然而這個範疇在臺灣學界似乎還未有很好的開發。上世紀末《中外文學》曾組織了一個「中西書信體文學」專輯（第22卷第11期，1994年4月），編者胡錦媛說：「本專輯共收四篇論文，三篇討論西方書信體文學，只有一篇討論中國書信體小說。這種篇幅數量上的不平

衡十足反映了書信體文類在西方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上個別不同的發展和地位。」其觀察是否準確當然可以討論，但這個課題之研究量偏少，卻無可置疑。

有見於此，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的文論研究中心特別邀請中心成員陳皇華教授以「書信東亞（Writing East Asia）：書信體的東亞脈絡」為題，主持兩次「書信體工作坊」（2022年5月11日及2024年3月15日），先後參與者有國內不同院校的專家學者與研究生，就更廣闊的角度討論東亞地區的書信文學。討論要點包括：在現代理論觀照下，東亞傳統的「書信體」展現出何種形態與功能？其發展之跡有甚麼文化與社會意義？從溯源、返古隔代遺傳及歷史斷裂等視角來看，東亞脈絡下的當代書信體是否有新異的演變？什麼原因造就「東亞脈絡」此一特殊的書信體復興？以至在此積極、有意識的創作中，可以觀察到何種重複模式、主題、傾向與侷限？這些創作提供了哪些重新思索「書信體例」的可能？經過反覆切磋攻錯，大家帶著各種問題意識回到各自的研究進程，繼續打磨深化；預計未來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展現。《清華中文學報》編輯部對「書信體文化」這個極有潛力的議題也感興趣，與文論研究中心及工作坊參與者商議後，安排部分最新成果，經學報評審通過刊出，為學界提供貢獻。

這三篇先發的文章分別為：戴華萱〈來自幽魂的書信：鍾文音《想你到大海：百年前未完成的懸念，來到了兩水的盡頭》的書信體研究〉；Tung-An Wei, “*Letters from Thailand and Qiaopi in the Age of Cold War*”（魏同安〈冷戰時代下的僑批：從《來自泰國的信》談起〉）；Huang-Hua Chen, “*The Disappearing Marriage Proposal in the Modern Editions of Pamela*”（陳皇華〈當代《潘密拉》版本中消失的書信婚議〉）。

戴華萱文探討鍾文音如何匯合書信體與志怪傳統，闡釋其中書信敘事的可塑性，特別是施用於內視與自剖，展示不同的價值觀與反思

的作用。魏同安分析泰國作家 Botan 的書信體小說《來自泰國的信》（*Letters from Thailand*, 1969），一方面揭示東西冷戰對於個人的影響，又細析小說中的書信如何在兩大陣營中之間傳遞，從而彰顯僑批傳遞過程的危脆。陳皇華則研究當代書信體的印刷版本，以嶄新的文本閱讀見證書信體的物質性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學研究中有何重要意義。

三篇論文無論就研究對象以至研究方法，對「書信體」不同面向的研究都有所推進。我們期望這次集結的專輯文章成為催化劑，可以引發更多同道投入這個議題的探索，特別是在工作坊討論過程中有所觸碰，但尚待深究的中西書信文化觀念與表現的比較與匯通。